

#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曼陀罗： 理论、历史与现实话语<sup>\*</sup>

吕振纲

**【内容提要】** 曼陀罗这一概念具备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及案例研究的创新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曼陀罗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国际体系分析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东南亚本土丰富的一手文献资料以及东南亚史学的经典著作有助于重构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全貌。借助这些文献，曼陀罗可用于阐释古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的互动历史及规律。东南亚历史上存在宪章国家、港市国家、高地政体及村庄政体等政治行为体，不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构成了相互交错的曼陀罗。从区域层面看，曼陀罗是一个复数的区域体系，这一体系的文化基础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即使经历了伊斯兰文化变迁仍未丧失曼陀罗的特色。从互动进程来看，多中心的互动形成了历史上三种相对稳定的体系模型，分别是中心—边缘模式、上游—下游模式和高地—低地模式。东南亚地区大国与域外国家的交往同样丰富，尤其与中国的互动引发了曼陀罗与朝贡关系的争论，尽管这两个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世界秩序观念、朝贡和战争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使得曼陀罗作为独立的区域秩序而存在。对现代国际政治而言，曼陀罗依然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具备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力，同时有利于分析和解释当今的东南亚政治甚至世界政治。

**【关键词】** 曼陀罗；朝贡体系；国际体系；区域秩序；东南亚地区

**【作者简介】** 吕振纲，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广州 邮编：5106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3)07-0002-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曼陀罗国际体系的生成与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1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与不足由笔者负责。

## 一 问题的提出

出于对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思,以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历史模式和实践中发掘或发展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路径。阿查亚为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设定了六个维度的研究议程,其中一项名为“从区域研究中发现新的模式、理论和方法”的议程强调了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深度融合的重要性。<sup>①</sup> 在长达十多年的理论对话和实践摸索过程中,中国、印度、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区的学者加入其中,贡献了各自的本土智慧和真知灼见。凭借丰富的古典国际关系文本和精彩的国际互动历史与实践,印度和中国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成就较为显著。尽管尚未诞生公认的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流派,但印度学者围绕本国经典的国际关系文本(如橘底利耶的《政事论》),充分挖掘了印度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及对外战略,并将其放置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解读,“橘底利耶学派”已然呼之欲出。<sup>②</sup> 一些中国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或研究方法出发,重新解读本土的国际关系经典文本和历史个案,旨在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尝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除上述两种方法外,中国学者还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出发,立足亚非拉世界的传统政治概念,发展出有别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也应当被视为中国学派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东南亚本土传统的历史知识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sup>③</sup> 如果把东南亚本土的历史文本、传统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融入国际关系范畴,东南亚区域研究将会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新内容并带来新启迪。

在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之前,东南亚地区盛行的是各种本土政治体系,其中的“曼陀罗(mandala)”体系就得到了东南亚史学界及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承认,这为检验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652.

<sup>②</sup> 参见橘底利耶著,朱成明译:《利论》,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利论》又译《政事论》,为便于论述,本文统一称为《政事论》。围绕《政事论》的解读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参见 Deepshikha Shahi, *Kautilya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New Delhi: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Medha Bisht, *Kautilya's Arthashastra: Philosophy of Strateg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9; Kajari Kamal, *Kautilya's Arthashastra: Strategic Cultural Roots of India's Contemporary Statecraft*,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sup>③</sup> Alan Chong, “Southeast Asia: Theory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7, No.3, 2007, p.391.

国际关系理论及拓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曼陀罗进行论述：第一，曼陀罗是什么？对曼陀罗进行界定前需要厘清这一体系在概念上的相关争论，并从单元、结构和文化等层面描述其基本特征，以证明该体系在国际体系研究中的独特价值。第二，曼陀罗的内外互动实践是什么？在东南亚地区内部，大大小小的政治单元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和实践规律？另外，东南亚本土政体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引发了对曼陀罗与朝贡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第三，曼陀罗如何推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曼陀罗视角有助于检验并完善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能够为东南亚区域研究及世界政治的分析带来新的启迪。

## 二 曼陀罗：理解东南亚本土的政治体系

### (一) 曼陀罗的概念

从词源学上来说，“曼陀罗”这一术语源自梵文，其中“*manda*”意为“圆形”“本质”等，“*la*”有“容器”“拥有者”等意，两者合起来有“圆满”“轮圆具足”之意。<sup>①</sup> 在宗教意义上，曼陀罗被视为一种宇宙图式，是印度教和佛教象征化的神圣空间。然而，曼陀罗也存在一个悖论：虽然它是以一种中心的、对称的和定向的模式构建，但在印度教—佛教形式中，它却试图传递世界虚空的观点——“现实为空，没有本质，没有稳定的核心”。<sup>②</sup>

20世纪初，曼陀罗作为描述印度政体和政治关系的术语被引入国际政治研究。1905年，惰底利耶的《政事论》在印度被重新发现并被整理、翻译和出版，促进了这一梵文术语的传播。印度学者贝诺·萨卡尔(Benoy K. Sarkar)最早研究了曼陀罗政治思想，并将其作为“权力均势”的代名词，成为印度教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sup>③</sup> 20世纪60年代，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面对国内较强的抵制情绪和战争挫折感，美国学界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东南亚问题，了解东南亚传统国际关系思维及对外行为逻辑。因此，曼陀罗作为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受到美国学界的重

<sup>①</sup> Mark Williams, “Mandal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agindanao Muslim Society,” *Culture Mandala*, Vol.7, No.2, 2007, pp.1-11.

<sup>②</sup> Martin Brauen, *Mandala: Sacred Circle in Tibetan Buddhism*, New York: Rubin Museum of Art, 2009, p.15.

<sup>③</sup> Benoy K. Sarkar, “Hindu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3, No.3, 1919, pp.400-414.

视。<sup>①</sup>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a)最早将曼陀罗引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sup>②</sup>此后,有关东南亚曼陀罗政治的讨论在学界逐渐增多。

无独有偶,历史学方面的学者也从东南亚的自治历史中寻找西方国家概念的本土替代品。<sup>③</sup>早在1968年,历史学家沃尔特斯(O. W. Wolters)援引“拉惹曼陀罗(raja-mandala)”理论,解释了在明末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暹罗主动请求帮助明朝并设想在海上攻击日本这一外交决策和行为的背后逻辑。<sup>④</sup>之后,他将曼陀罗视为东南亚区域内部关系互动的主导范式。沃尔特斯指出,东南亚地区内部存在的互动体系往往是由重叠的曼陀罗构成的。理论上,东南亚的本土国王被赋予神圣和普遍的权威,宣称自己对曼陀罗中的盟友和附庸拥有霸权。在实践中,曼陀罗代表着“在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中往往存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在这一地区中,那些小的权力中心向各方求助以获得安全。当有机会时,其中的一些朝贡国就会摒弃它们的臣属状态,并试图建立起它们自己的臣属网络”。<sup>⑤</sup>这一定义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概念形成鲜明对比,曼陀罗中的不同政治单元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领土边界并缺乏稳定性,大的政治中心与次级政治中心之间存在一种朝贡关系。

与之类似的概念包括分段国家(segmentary state)、星云政体(galactic polity)和尼加拉(negara)等,这些概念均可以被视作对曼陀罗这一术语的替代。人类学家艾丹·索撒尔(Aidan W. Southall)创造了分段国家的概念,强调中央权威的有限性以及中心与外围的权威分散。<sup>⑥</sup>赫尔曼·斯坦(Hermann Stei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他将国家主权区分为政治主权和仪式主权,分段国家在中心拥有政治主权和仪式主权,但在边远地区随着该国政治控制能力的减弱,政治中心对边缘次级中心的政治权威退化到

<sup>①</sup> Kenneth Young and Lyman Tonde, *The Southeast Asia Crisis: Background Papers and Proceedings*,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66, p.17.

<sup>②</sup> George Modelska, “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8, No.3, 1964, pp.549–560.

<sup>③</sup> Craig Reynolds, *Seditious Histories: Contesting Thai and Southeast Asian Pas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38.

<sup>④</sup> O. W. Wolters, “Ayudhyā and the Rearward Par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00, No.2, 1968, pp.166–178.

<sup>⑤</sup>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EAP Publications, 1999, pp.27–28. 此处部分中文翻译参见通猜著,袁剑译:《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sup>⑥</sup> Aidan W. Southall, *Alur Society: 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 Münster: LIT Verlag, 2004, pp.249–252.

仪式霸权或仪式主权。<sup>①</sup> 泰国历史学家苏奈特·丘廷塔拉农德(Sunait Chutintaranond)将分段国家用于分析阿瑜陀耶时期的泰国。<sup>②</sup> 法国学者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将古代占婆(Champa)也纳入分段国家行列,认为占婆分段国家内部存在一个连接各个政治中心的一体化机制。<sup>③</sup>

受曼陀罗这一概念的启发,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创造了“星云政体”这一术语,将其描述为“一个由差异化卫星国家环绕的中心行星,这些卫星或多或少是在轨道上和中心势力范围内的自治实体”。<sup>④</sup> 卫星国家距离越远,中心的引力就越弱。星云政体随着中心国家的衰落而解体,而新崛起的中心国家又会成为新的星云政体中心。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认为星云政体这一表述不够精确,转而提出“太阳系政体”的说法。他认为,每一个王国都是太阳系政体,这个概念能够恰当地描述出“周边的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的引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这一趋势。<sup>⑤</sup> “尼加拉”的概念经由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印尼巴厘岛上传统政治体系的阐释而著名。尼加拉中存在一个典范中心,但典范中心并不谋求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而是安于满足仪式的展示,因此仪式是其国家存在的核心。<sup>⑥</sup> 另外,在马来世界(Malay World),“克拉贾(kerajaan)”通常被视作曼陀罗的代名词,被用来描述在马来文化影响下古代马来诸国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体系。<sup>⑦</sup>

应当承认,曼陀罗、尼加拉和星云政体等概念和术语尽管是被现代学者创设的,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概念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有效推广和承认。因此,这些概念更多是一种解释学上的辅助,而不是一种存在的现实。<sup>⑧</sup> 相对于其他概念,尽管曼陀罗这

<sup>①</sup> Hermann Stein, “Ritual Sovereignty and Ritual Policy: Some Historiographic Reflections,” in Axel Michaels, ed., *State, Power, and Violenc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pp.603–626.

<sup>②</sup> Sunait Chutintaranond, “Mandala, Segmentary State and Politics of Centralization in Medieval Ayudhya,”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78, No.1, 1990, pp.89–100.

<sup>③</sup> Andrew Hardy, “Champa, Integrating Kingdom: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egmentary State,” in Arlo Griffiths, Andrew D. Hardy and Geoff Wade, eds., *Champa: Territories and Networks of a Southeast Asian Kingdom*,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9, pp.221–252.

<sup>④</sup> Stanley Tambiah,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13.

<sup>⑤</sup>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3.

<sup>⑥</sup> Clifford Geertz, *Nega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3.

<sup>⑦</sup> 关于克拉贾体系的相关研究,参见 Anthony Milner, *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82。

<sup>⑧</sup> Craig Reynolds, “A New Look at Ol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4, No.2, 1995, p.427.

一表达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描述古代东南亚国际体系较为合理的术语。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曼陀罗作为典型的国际关系术语,其出现早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其二,其他几个术语的流行和适用范围都不如曼陀罗广泛。例如,分段国家在东南亚的应用范围并不太广,星云政体更像是曼陀罗这一术语在以泰国为代表的佛教世界的翻版,尼加拉被认为是描述海岛地区政治关系的词汇。吉尔茨对尼加拉的解读虽然颇有新意,但引起的争论更为激烈。<sup>①</sup> 在吉尔茨之后,一些关于东南亚古代王国的历史研究不断强调回归传统,重视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大国的政治经济基础,<sup>②</sup>这些正是曼陀罗这一术语要表达的核心要义。

## (二)前现代东南亚的本土政治体系

按照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观点,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sup>③</sup> 因此,对国际体系的描述需兼顾体系单元和体系结构两个层次。另外,考虑到前现代不同区域的国际体系存在文化异质性,这一文化差异对于解释体系规则和区域秩序的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从体系单元、体系结构和区域文化三方面对东南亚本土的政治体系展开描述。

### 1.基本单元

前现代东南亚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用“政治行为体”这一宽泛的术语对其进行描述会比较合适。东南亚历史上至少存在五类不同的政治行为体:一是宪章国家(charter state)。维克多·利伯曼用这一术语描述了10—14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先后崛起的一些王朝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特点是管理机构分散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它们的宗教、王朝传统和领土惯例等被该地区之后出现的国家视为典范,并被它们效仿和继承。<sup>④</sup> 二是港市国家或港口政体(port polity)。<sup>⑤</sup> 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和东南亚大陆的下游河流地区存在着诸多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小型政体,港口政体之间通过结盟形成更大的港市国家。三是高地政体(highland polity)。在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以及加里曼丹岛等高山地区分布着众多山地民族。高

<sup>①</sup> Graeme MacRae, “Negara Ubud: The Theatre-State in Twenty-First-Century Bali,”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16, No.4, 2005, pp.393–413.

<sup>②</sup> Ian Caldwell, “The Myth of the Exemplary Centre: Shelly Errington’s Meaning and Power in a Southeast Asian Real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2, No.1, 1991, pp.109–118.

<sup>③</sup>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sup>④</sup> Victor Lieberman, “Charter State Collapse in Southeast Asia, ca.1250–1400, As a Problem in Regional and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6, No.4, 2011, pp.937–963.

<sup>⑤</sup> J. Kathirithamby-Wells and John Villiers, eds., *The Southeast Asian Port and Polity: Rise and Demis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16.

地民族通常分化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独立和相对简单的政权结构，其内部存在等级制度的民族；另一类是遵循平等主义的原则进行组织的民族。四是村庄政体（village polity）。村庄政体以村庄为政治权力的中心，政治实体无法构成一个国家单位甚至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但拥有对村落事务的最高权力，并且这种权力不依赖于其他外来的权威或任命。这类组织最典型的是菲律宾的巴朗盖（Barangay）和黛博拉·图克（Deborah Tooker）描述的阿卡（Akha）村庄。<sup>①</sup> 五是公司国家（company-state）。这一政体形式脱胎于原来的殖民港口，但与港口政权有很大的不同，典型的代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此类政治实体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但其具备广泛的行政、贸易、领土和外交权力，因此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sup>②</sup>

并非所有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都能形成曼陀罗。例如，尽管巴朗盖算是一个独立的曼陀罗，但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意义并不大。因此，需要发展一种有关东南亚本土政体的类型学，以识别哪些政体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要成为东南亚古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应该符合两项要求：其一，政治行为体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实力，有一定的人口、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活动空间，具备相对独立或半独立的对外活动能力。其二，应当有充分的史料和文物等资料证明它们具有丰富的跨国跨地区的互动历史和实践。按照这个标准，村庄政体虽然是自治的行为体，但基本上没有国际交往，难以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存在。宪章国家和公司国家凭借实力地位可以纳入其中，港市国家和高地政体则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判定，只有那些被证明在历史上参与国际贸易或进行跨国跨地区互动的行为体才可以作为曼陀罗的基本政治单元。

曼陀罗中的政治行为体通常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主权的非独立性。传统的东南亚政体形式为金字塔形，它们由在功能上并无差别的政治单元遵循等级制度排列而成。政治等级中的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权力，但各级领导人可获得的权力基本相同。<sup>③</sup> 王国可以看作是被最大的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s）包围的区域，但只有在中心，国王才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中心圆之外，国王则必须与各级地方的统治者共享主

<sup>①</sup> Deborah Tooker,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mong the Akha Prior to Globalization: Channeling the Flow of Lif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15–238.

<sup>②</sup> Philip Stern, *The Company-State: Corporate Sovereignty and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

<sup>③</sup> G. Carter Bentley, “Indigenous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15, No.1, 1986, p.292.

权。<sup>①</sup> 二是领土的不确定性。曼陀罗中的各个政治中心不存在稳定的领土边疆，其疆界是流动和易改变的。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前，东南亚国家基本不能准确说出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这一特征也充分体现出东南亚国家领土的“无定形”特征。<sup>②</sup> 当然，国家领土边界的模糊性并不妨碍不同的政治中心在地理上通过相对简单的河流、山脉和森林等延伸出来的自然分界线进行划分边界。<sup>③</sup> 三是政体的非官僚性。统治者个人而非官僚程序对政体的维系至关重要。统治者本身的权力受到限制，并且要与其周边或者下面的次级政治中心竞争更大的权威。因此，统治者必须具备一种吸引追随者的能力，沃尔特斯将其称为“有能力的人”，他们是克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凭借个人超凡的特质吸引追随者的关注和忠诚，同时能给予追随者适当的回报。如此一来，统治者与追随者之间出现了一种广泛的“赞助人—客户（patron-client）”关系。四是曼陀罗在国家管理中需具备两项技能：发展国内外的间谍网络获得更多的政治情报以及善于运用外交手腕。<sup>④</sup> 这些都与儒底利耶的政治教诲相符。

## 2.体系结构

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统一或统治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国，所以该地区的曼陀罗是多元的复数体系，而非单一体系。东南亚的历史可以看作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互动的历史，这种互动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化但在某些时刻又相对稳定的体系结构。区域曼陀罗的结构以单一曼陀罗为基础。一般来说，单一的曼陀罗内部存在鲜明的圈层结构，通常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圈层，分别是核心区、依附区和朝贡区。<sup>⑤</sup>

如果把目光放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无论是中南半岛还是海岛地区，每一个大国都会不遗余力地建设以自己为中心的曼陀罗政治圈，夹在大国之间的朝贡国往往会展

<sup>①</sup> Henk Schulte Nordholt, *The Spell of Power: A History of Balinese Politics, 1650–1940*, Leiden: KITLV Press, 1996, p.9.

<sup>②</sup> Pierre-Yves Manguin, “The Amorphous Nature of Coastal Polities in Insular Southeast Asia: Restricted Centres, Extended Peripheries,” *Moussons-Recherche en Sciences Humaines sur l'Asie du Sud-Est*, No.5, 2002, p.73.

<sup>③</sup> Soemarsaid Moertono, *State and Statecraft in Old Java: A Study of the Later Mataram Period, 16th to 19th Century*, Sheffield: Equinox Publishing, 2009, p.115.

<sup>④</sup>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p.29.

<sup>⑤</sup> Victor Lieberman, *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 Anarchy and Conquest, c.1580–17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64–65.需要指出的是，曼陀罗的圈层结构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虽然都承认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但两者仍然有很大的区别。曼陀罗是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基于实力差异和政治互动关系形成的政治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则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分工差异形成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生产及交换体系。在这种中心—外围结构中，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曼陀罗的不同圈层虽然也承认存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但同时也存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多层次互惠交换，剥削性的经济关系并不严重。

依附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曼陀罗中心。相邻的曼陀罗通过中心之间、中心与朝贡国以及中心与外圈国家等多边互动相互连接，组成了相互交错的区域曼陀罗。曼陀罗的中心通常是地区大国，相对朝贡国拥有更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与此同时，这些中心本身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转换和发展的过程中。从纵向历史看，东南亚历史变迁的基本轨迹是多中心不断减少、小的政治中心不断被合并或壮大的历史，王国的政治变迁或遵循“村庄—区域中心—超区域中心”的动态演变过程，<sup>①</sup>或遵循“地方—地区—帝国”的扩张过程，<sup>②</sup>或遵循“宪章管理—分散式的印度化管理—集权式的印度化管理—中国式官僚管理”的动态管理模式。<sup>③</sup>

从朝贡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多个曼陀罗中心，并且这些中心之间相距并不太远，这必然导致不同中心的势力范围相互重叠。在势力重叠的边缘地带，地区小国为求自保和生存，常常向邻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朝贡和靠拢。朝贡国的主权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排他的，而是多重共享的主权。<sup>④</sup>

### 3. 文化特征

第一，作为东南亚本土的区域秩序，曼陀罗有其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内涵。曼陀罗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精神的中心。东南亚地区在整体上可以被视为一个由曼陀罗文化构成的意义世界。曼陀罗文化最初的核心是印度文化，主要包含印度教、佛教文化和印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它们建构了东南亚的世界秩序观念，作为共有知识规定着体系的文化意义并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的互动规则和行为。印度文化塑造了东南亚的宇宙想象和世界秩序观念。东南亚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宇宙与人类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对应关系，国家与宇宙之间的和谐是通过将自身组织作为一个较小规模的宇宙来实现的。<sup>⑤</sup> 根据印度教的教义，梅鲁山(Mount Meru)是宇宙的中心，有三十三重天，它被环形海洋相互隔开的七座山脉环绕，梅鲁山以南的大陆是人类居住的南瞻部洲。<sup>⑥</sup> 这种宇宙图式被东南亚各国所接受，东南亚所有的地区大国都把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中心，梅鲁山、四大洲、七大洋和三十三重天等形象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各

<sup>①</sup> Renée Hagesteijn, *Circles of Kings: Political Dynamics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Leiden: KITLV Press, 1989, pp.16–22.

<sup>②</sup> Hermann Kulke, *Kings and Cults: State Formation and Legitimation i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2001, p.273.

<sup>③</sup>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p.35.

<sup>④</sup> 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10页。

<sup>⑤</sup> Robert Heine-Geldern,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 No.1, 1942, p.15.

<sup>⑥</sup> I. W. Mabbett, “The Symbolism of Mount Meru,”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23, No.1, 1983, pp.64–83.

国的早期国家建构。这种独特的世界秩序理念通过与数字命理学相结合,进而影响了整个东南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影响的地区,这种宇宙观念最终以三界宇宙观的形式出现。

第二,宗教与王权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东南亚各国政治的基础。王权与宗教观念的联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与印度教的神王观念相联系。<sup>①</sup> 在神王合一的理念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古代高棉(Khmer)发展起来的提婆罗阇(devaraja)崇拜。<sup>②</sup> 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王崇拜,经过特殊的婆罗门礼仪之后,国王就获得了神性,可以在特定的神圣场所与作为宇宙支配者的众神进行交流。当国王死后,其肉身化为神体,国王本人也被当作神加以崇拜。另外一种与佛教的理念相结合。诸如王法(rajadharma)、法王(dharmaraja)、转轮圣王(cakravartin)和业(karma)等观念促使国王积极拥抱现实世界。佛教的世界秩序理念鼓励君主在国际体系中积极行动。转轮圣王的理念鼓励君主对当时的国际体系承担责任,成为拥有七宝(分别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和典兵宝)的世界征服者,为世界带来和平。同样,业的观念也鼓励君主采取行动。按照印度教—佛教的宇宙观念,宇宙中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其前世的业所决定的。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是由于其前世的功德。功德越多,国王的业力就越大。君主发动战争可以积累功德。国王越是投入战争,来世就越能享受福报。这无疑鼓励了国王的扩张和冒险行为。

第三,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塑造了国际体系中普遍的权力观念。在东南亚的古老信仰中,所有的权力都包含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充满精神的力量,一个人要想活下来并且活得好,就必须懂得如何驾驭这些力量。<sup>③</sup> 这种力量被称为“灵魂之物(soul stuff)”,拥有更多灵魂之物的人是天生的领导者。对精神之力的拥有程度以及同辈对灵魂之物拥有的认可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sup>④</sup> 君主可以通过瑜伽练习和极端禁欲主义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创造力。<sup>⑤</sup>

东南亚的权力观念是矛盾的。一方面,国王的权力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这种权力来自神,不受世俗政治的制约。因此,各国君主会竭尽所能用华丽的辞藻

<sup>①</sup> 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sup>②</sup> Hermann Kulke, *The Devaraja Cult*, Cornell: The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78, pp.24-36.

<sup>③</sup> 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6页。

<sup>④</sup> Charles Charney, *Southeast Asian Warfare, 1300-1900*, Leiden: Brill, 2004, p.1.

<sup>⑤</sup> Stanley Tambiah, *The Buddhist Saints of the Forest and the Cult of Amule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7.

赞美王权。另一方面,受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东南亚的权力观念更强调权力的暂时性而非永久性。君主在“轮回”的世界中有一个位置,但也逃不脱轮回的命运,只是一个轮回的主体躯壳而已。<sup>①</sup>这种权力观本质上来源于更为古老的宇宙观念。爪哇人的宇宙观分为权力集中时期的宇宙和谐与权力扩散时期之间的宇宙振荡。<sup>②</sup>在权力集中时期,新的曼陀罗中心建立起来;在权力扩散时期,权力开始从中心退去,统治王朝失去统治权、出现混乱,接下来权力集中的过程重新开始。上述过程形成一个轮回。

除印度的宗教文化外,印度的政治文化对君主的对外扩张也起到重要作用。《政事论》和《处世精要》等著作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成为各国君主治国的依据。这些著作告诫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运用权谋以及扩大外交手段从而成为曼陀罗中的征服者。毫无疑问,印度的政治哲学同样会影响不同国家间的互动,并鼓励有能力的君主努力成为地区霸主。它同印度宗教一起塑造了体系的文化内涵和可供借鉴的互动规则,为东南亚区域的历史变迁注入动力和源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东南亚的区域文化承袭了印度文化,但已经与原来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南苏拉维西的卢武(Luwu)王国,尽管存在曼陀罗式的君主政体,但印度文化的痕迹很少。<sup>③</sup>另外,区域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伊斯兰教很快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站稳了脚跟,逐步在一些地方取代原来的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统治者不能再援引神明来称呼自己,也不能神化自己,原来的神王观念让位于伊斯兰教中“完美的人(perfect man)”的观念,王权的称号从印度特色变成了伊斯兰特色。对伊斯兰教的接受也为该地区注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念。在这一秩序中,统治者被称为哈里发,其统治范围被称为“和平之家”。随着伊斯兰宇宙观的加入,它与原有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宇宙观共同支撑起东南亚的文化秩序。

结合东南亚本土政治体系的单元、结构和文化特征,曼陀罗可以被定义为前现代东南亚地区受到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外来文化熏陶,在长期的政治发展中形成以本土较大的政治行为体为中心,并与周边的次中心甚至更次一级的政治单

<sup>①</sup> 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页。

<sup>②</sup>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5.

<sup>③</sup> Shelly Errington, *Meaning and Power in a Southeast Asian Rea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8–29.

元发展成为多中心、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不同层次的互动形成中心—边缘式的圈层结构，在政治交往、战争和外交等关系中遵守东南亚本土普遍的社会文化规则。由于曼陀罗并不存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中心，所以不存在单一的文化规范以及等级偏好的霸权稳定结构。在本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行为体可以被区分为宪章国家、港市国家和高地政体等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它们具有主权的非独立性、领土的不确定性和政体的非官僚性三个典型特征，这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个地区大国都力图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曼陀罗圈，较小的朝贡国往往需要同时向周边多国朝贡以求得安全保护，这使得多边朝贡成为小国生存的一个普遍现实。一旦有机会壮大自身力量或者摆脱大国控制，朝贡国也会不遗余力地逆转这种等级关系并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曼陀罗圈。但在不同的政治中心之间，大国间相对均衡的实力和地位又促进了平等的国际交往和外交惯例。因此，在相互重叠的曼陀罗中，等级制的霸权结构与平等的国家互动模式同时共存。

### 三 曼陀罗的内外互动与实践

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体系，在历史长河中，单一曼陀罗、不同的曼陀罗之间、地区大国与域外大国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理解这些内外互动关系及实践可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提供更多检验理论的案例选择。

#### (一) 区域内的体系互动

由于存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以及地理距离的限制，<sup>①</sup>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进行复杂的互动和交往，形成了几种相对稳定的区域体系互动关系模型。这种结构性互动和变迁的历史成为解读东南亚国际体系变迁的钥匙。区域内的体系互动主要表现为三种稳定的模式：中心—边缘模式、上游—下游模式和高地—低地模式。

第一种是中心—边缘模式，也可称之为大国中心模式。这一互动模式在东南亚历史中最为常见。以东南亚地区较大的王朝国家为中心，王朝国家与其他实力相对较弱的宪章国家或港市国家之间等建立朝贡关系。公元1世纪兴起的扶南(Funan)王国曾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曼陀罗中心。但扶南只是地区一系列政治中心的联盟，曼陀罗

<sup>①</sup> Geoffrey Gunn,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8.

的中心在不同的联盟之间转换。<sup>①</sup>继扶南之后,东南亚地区兴起了许多地区性的曼陀罗中心。从公元9世纪开始,东南亚大陆和海岛地区进入了宪章国家时期,高棉和室利佛逝(Srivijaya)先后称霸东南亚地区的半岛和海岛。到16世纪中叶,东南亚大陆地区逐渐显现出三大曼陀罗地区中心,分别是缅甸的蒲甘王朝、泰国的大城王朝以及越南的李朝和陈朝等,其继任者也相继巩固了各自的曼陀罗中心地位。在海岛地区,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朝衰落之后,爪哇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崛起的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一度统一了除爪哇岛外的整个外岛地区(Nusantara),满者伯夷的势力达到顶峰。

关于曼陀罗大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其史料颇为丰富。根据既有神话、编年史、铭文等第一手材料以及当前东南亚研究丰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可以重建东南亚诸大国互动的国际关系史。以大陆东南亚国家为例,20世纪70—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曼陀罗的概念探讨暹罗、缅甸和老挝等国的王权及对外关系。<sup>②</sup>17—19世纪,中南半岛上大国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缅甸实力显著增强之后,与暹罗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改变了半岛上的权力分配。实力相对较弱的兰纳王国、老挝、高棉等与缅甸及暹罗均存在复杂的朝贡与互动关系。大越在吞并南部的占城之后,也加入了对老挝、高棉等较弱朝贡国的争夺。这些涉及多方政治行为体的地区大国争霸史具有典型的国际关系意义。<sup>③</sup>

第二种是上游—下游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单元行为体主要围绕河流的上下游形成河谷曼陀罗中心并与上游森林或高地中心进行互动。河流可以作为一种范式,为理

<sup>①</sup> Paul Munoz, *Early Kingdoms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6, p.78.

<sup>②</sup> 相关研究参见 O. W. Wolters, *Early Southeast Asi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SEAP Publications, 2008; Soren Ivarsson, *Creating Laos: The Making of a Lao Space Between Siam and Indochina, 1860–1945*, Copenhagen: NIAS, 2008; John Clifford Holt, *Spirits of the Place: Buddhism and Lao Religious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Victor Lieberman, *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 Anarchy and Conquest, c.1580–17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p>③</sup> 相关研究参见 Sunait Chutintaranond, *Cakravartin: The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Warfare in Siam and Burma, 1548–1605*,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Khin Sok, *Le Cambodge entre Le Siam et Le Vietnam*, Paris: EFEQ, 1991; Mak Phoeun, *Histoire du Cambodge de la fin du XVI<sup>e</sup> au début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Press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aris, 1995; Mayurī Ngaosivat and Pheuiphanh Ngaosyathn, *Paths to Conflagration: Fifty Years of Diplomacy and Warfare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1778–1828*, Singapore: SEAP Publications, 1998; Volker Grabowsky, *The Northern Tai Polity of Lan Na (Babai–Dadian) Between the Late 13<sup>th</sup> to Mid-16<sup>th</sup> Centuries: Internal Dynamics and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urs*,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and Its Neighbors in the 15th Century*,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解传统东南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贝内特·布朗森(Bennet Bronson)首次提出了以河流系统为中心的上下游交换模式。他设想了一个包含河口中心、上游二级和三级中心、上游初级中心和产品生产地等在内的河流交换网络。<sup>①</sup> 在这个网络中,下游的河口中心可能成长为最具实力的政治中心。为此,它们既需要控制上游的货物分销中心,也需要与其他河流的河口中心展开竞争。

上游—下游模式在马来半岛和海岛东南亚的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沿着布朗森的思路,学者们在东南亚的许多河流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上下游交换体系。这一模式已经在东南亚多国的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肯尼思·霍尔(Kenneth Hall)将布朗森的模型应用于解释巴塞王国和占婆地区的政治互动。<sup>②</sup> 卡蒂里塔姆比-韦尔斯(J. Kathirithamby-Wells)等将布朗森模型应用于苏门答腊地区。<sup>③</sup> 迈克尔·昂-特文(Michael Aung-Thwin)则将上下游模式的研究应用于15世纪缅甸的历史。<sup>④</sup> 总体而言,这一模式为理解港市国家的成长及其国际互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三种是高地—低地模式。该模式适应了东南亚的山地地区以及毗邻的低地平原的地形,突出了高地群体与低地政治中心的交流与互动。这一模式存在两种典型的互动形态:一是在常态下的高地低地交往形态。这一模式通常以高地部落、地区或王国为研究中心,关注其与低地中心互动以及受低地中心影响进而导致经济社会体系的变迁。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克钦社会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利奇的论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始终围绕克钦人活动的缅北高地展开,但在其研究中处处体现出低地对高地的影响以及高地与低地地区的联系与对比。这种以高地为中心但充分关注高地与低地的互动模式可以称为“利奇模式”。二是非常态下的高地低地互动形态。该形态强调高地与低地的差异、对抗及疏离。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up>①</sup> Bennet Bronson, "Exchange 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ds: Notes Toward a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Coastal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n Karl Hutterer, ed., *Economic Ex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s from Prehistory,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39–52.

<sup>②</sup> Kenneth Hall,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Unification in Southeast Asia's First Islamic Polity: The Changing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kayat Raja-Raja Pasai Court Chronicl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44, No.2, 2001, pp.198–229; Kenneth Hall, "Competi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Mainland: Early Champa and Vietnam Political Economies," in Kenneth Hall, ed., *A History of Early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2011, pp.67–102.

<sup>③</sup> J. Kathirithamby-Wells, "Hulu-Hilir Unity and Conflict: Malay Statecraft in East Sumatra Befor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rchipel*, Vol.45, No.1, 1993, pp.77–96; Barbara Andaya, "Upstreams and Downstreams in Early Modern Sumatra," *The Historian*, Vol.57, No.3, 1995, pp.537–552.

<sup>④</sup> Michael Aung-Thwin, "A Tale of Two Kingdoms: Ava and Pegu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42, No.1, 2011, pp.1–16.

Scott)强调高地民族逃离低地国家控制的“赞米亚(Zomia)”模式。<sup>①</sup> 赞米亚是一个没有王权的高地政体,甚至可能不存在集权政体。然而,并非所有的赞米亚地区都不存在王权。赞米亚内部并不完全是非国家空间,它是大量小型的、有着松散联系的和处于各种社会形态下小邦国的聚集地。<sup>②</sup> 换言之,赞米亚的内部依然可能存在曼陀罗。另外,赞米亚与低地较大的政治中心(有时候可能不止一个)同样存在复杂互动关系,高地人常常抵制低地中心的整合,甚至奋起反抗,这意味着赞米亚从未疏远曼陀罗。

古代东南亚国际体系互动的三种模型都不乏追随者,但是每一种研究路径都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和场景。上述三种互动关系模型本质上都是关系性的,但各自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中心—边缘模式往往以低地王国为研究重点,强调低地曼陀罗中心的主体性及其对边缘地区的影响和控制;上游—下游模式则强调上游与下游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通常又可以演化为下游河口或港口中心对上游地区的影响和霸权,尽管上游地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逆转这种关系;高地—低地模式通常以高地为中心,但难以避免讨论低地对高地的影响以及对高地的反抗。另外,三种体系模式的区分也并非完全对立。上游—下游模式和高地—低地模式没有否认传统的曼陀罗研究路径,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高地还是低地,大大小小的曼陀罗中心依然存在。在未来的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进行分析仍是可行的选择。

## (二) 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关系

曼陀罗为反思早期现代东南亚与西方世界的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在西方对东南亚的扩张过程中,本土的曼陀罗君主并非简单地臣服西方,而是利用西方或尝试将西方纳入曼陀罗的互动关系中。面对西方殖民者,一些小的政治实体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例如,望加锡(Makassar)这样的港市国家通过跨越水域和种族的亲属关系、共同利益联系与布吉斯(Bugis)等海洋族群结盟,在共同反对欧洲控制香料贸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up>③</sup>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意识到其在东南亚的统治并不能采取简单推翻当地统治者的手段,而是要有意识地利用、置换并最终取代本土曼陀罗大国的中心地位,最终成为体系的征服者。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征服就遵循了这种模式。在越南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后,法国以新的曼陀罗君主身份与暹罗争夺柬埔寨、老

<sup>①</sup>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1—39页。

<sup>②</sup>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 No.2, 2010, pp.187—214.

<sup>③</sup> Jennifer Gaynor, *Intertidal History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Submerged Genealogy and the Legacy of Coastal Captur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05.

挝等朝贡国，并最终排挤暹罗，将这些朝贡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典型的公司国家，在实力条件尚不具备时不得不遵循本土传统的范式与亚洲君主打交道，在逐步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过程中充分借用了传统的东南亚秩序和宇宙观念。<sup>①</sup> 在香料群岛，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岛上较小的君主国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盟和互动关系，并成功让自己成为该群岛最大的统治者。<sup>②</sup>

除此之外，东南亚与中国的朝贡互动和往来更受关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曼陀罗真的是一个独立的区域体系吗？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认为朝贡体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再反复思考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sup>③</sup> 东南亚是中国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曼陀罗似乎是东亚朝贡体系的翻版。<sup>④</sup> 朝贡体系内部也有圈层划分，东南亚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说的“外圈”以及李云泉所说的“一般的朝贡关系”。<sup>⑤</sup> 陈康令在探讨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体系时，把古代东亚地区划分为四个次级地缘区域，东南亚地区被视为曼陀罗区域而存在。<sup>⑥</sup> 甚至有观点认为，东南亚地区不存在独立的区域秩序。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不存在国家间关系的制度，东南亚的内部关系不过是王国的兴衰和各个独立王国之间的王朝征服战争。<sup>⑦</sup>

以上观点要么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考虑，要么基于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并未能准确地描述东南亚本土自身的特点。<sup>⑧</sup> 有西方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朝贡话语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它过于简化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交往与互动，忽略了古代中外交往的丰富内涵；其二，作为一套话语体系，朝贡话语忽略了东南亚的动机、行为以及文化内涵，对理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起到了某种消极作用；其三，该话语体系

<sup>①</sup> Kaoru Ueda et al., *Paths to Pow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lonialism: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Sultanate of Banten, Java, Indonesia, the Seventeenth to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p.89–119.

<sup>②</sup> Muridan Widjojo, *The Revolt of Prince Nuku: Cross-Cultural Alliance-Making in Maluku, c.1780–1810*, Leiden: Brill, 2008, pp.40–57.

<sup>③</sup>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sup>④</sup> Jérémie Jammes and Victor King, *Fieldwork and the Self: Changing Research Styl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p.369.

<sup>⑤</sup> 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

<sup>⑥</sup> 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9—50页。

<sup>⑦</sup> Lucian Py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 Culture, Nation and State*, Washington D.C.: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1998, p.6.

<sup>⑧</sup> 孙来臣：《中国东南亚研究述评》，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第92—102页。

限制了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中国学者不应局限于朝贡体系的框架来研究东南亚，而要从全球层面出发，在比较研究中转变见解，进而增进跨文化理解。<sup>①</sup>

以比较的方式可以区分朝贡体系和曼陀罗这两种区域体系。由于体系内部单元互动以及政治行为体实力的差异分布不同，任何一种区域体系的内部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朝贡秩序是一个典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结构体系，体系结构变迁的动力来自内部的分裂和变化；曼陀罗则始终是一个多中心的等级结构体系，体系结构变迁的动力来自地区内几个主要政治中心的互动和发展。在朝贡体系内部，古代中国通常是唯一的帝国，但朝贡国之间多是平等的友邦关系，多边朝贡的情况在朝贡体系内并不普遍。在曼陀罗内部不存在单一的朝贡中心，朝贡国的多边朝贡十分明显。从某种程度上看，朝贡体系是一个稳定的体系结构，曼陀罗则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构。

从文化上看，朝贡体系和曼陀罗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对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协同关系以及对君主神圣地位的强调。朝贡体系的文化基础是东亚共同的儒家文化，这一文化在本质上是世俗文化而非宗教文化。儒家虽然强调君主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但没有人将皇帝视作真神，皇帝去世后也不会获得神的地位，儒家文化其实更重视君主的德行。宇宙中存在一种天命，天命并非不可转移，统治者的“德”是推动天命转移的根本。类似东南亚君主那些神化自我的行为在正统的儒家文化中是被排斥的。当然，中国和东南亚的世界秩序观都承认等级是自然秩序，两者都试图通过塑造世界秩序的价值形态来实现权力的最大化。对古代中国而言，朝贡秩序是皇帝、世界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永久秩序，但对东南亚统治者来说，曼陀罗是对不断变化的业力游戏的临时构造。<sup>②</sup>

这两种区域体系都将朝贡视为最重要的互动形式。然而，朝贡具有不同的实践内涵和意义。在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朝贡是对中国皇帝的象征性臣服，甚至只是作为贸易的外衣或形式。但是，纳贡在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是一种臣服的标志。泰国国王将老挝和柬埔寨视为自身曼陀罗的一部分，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也被认为是泰国国王的臣民。因此，泰王拥有从这些国家征调劳动力的权力。<sup>③</sup> 此外，贡品在两种体系中的意义并不相同。东南亚呈送中国的贡品只是象

<sup>①</sup> Peter C. Perdue, “The Tenacious Tributary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4, No.96, 2015, p.1014.

<sup>②</sup> Martin Stuart-Fox,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ibute, Trade and Influenc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3, p.34.

<sup>③</sup> Michael Charney and Kathryn Wellen, *Warring Societies of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8, p.32.

征性的提交，并非一国经济资源的转移。古代中国皇帝按照“厚往薄来”的经济原则，朝贡国通常会得到更丰厚的回馈。在东南亚的政治互动中，朝贡更像是政治精英提取和集中剩余资源的主要手段。从经济意义上讲，纳贡构成了一种生产方式。<sup>①</sup> 朝贡国通过以货物和粮食供应的形式支付贡品，而这又巩固了曼陀罗中心大国的经济实力。

战争对两种体系而言同样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内涵。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稳定的和平体系，单一中心压制了竞争。与东南亚及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东亚内部的国家间战争可谓屈指可数，朝贡制度帮助东亚实现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儒式长和平。战争的结果通常以回归朝贡体系作为双方互动的均衡结果出现。<sup>②</sup> 而曼陀罗更像是一个战争体系。东南亚本土的大国与小国、大国与大国之间广泛存在安全困境，任何一方挑起的战争行为都会改变曼陀罗的短暂平衡。战争的结果可能对战败国更为残酷。失败的曼陀罗中心可能臣服胜利者或被消灭，其自身包括朝贡国都可能成为曼陀罗关系的一部分。

在东南亚地区，体系战争往往不排斥宗教原因。尽管这些宗教战争本质上都是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但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在佛教中，无常(anicca)是一种被承认的必然状态。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国家的强大与衰落都受制于这种无常状态。政治秩序充满了流动性，一切都是暂时和稍纵即逝的。强大的势力将被击败，新的力量将会崛起。这种世界秩序观的流动性与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伊斯兰教的兴盛，伊斯兰文化开始影响战争的发生，和平之家与战争之家的观念由此普及开来。

尽管存在观念、朝贡与战争等方面的差异，但朝贡体系与曼陀罗并不相互排斥，甚至可以相互兼容。两种区域体系都存在一些共同的体系要素，例如对朝贡和贸易活动的重视、对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关系平行关系的笃定以及对神王王权的强调等都是两种体系相通的重要内容。在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强调礼仪的互惠原则、文化先于物质的理念以及对商业贸易的重视，<sup>③</sup> 这些都与中国的朝贡外交兼容。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指出，“有组织的伪善(organized

<sup>①</sup> Martin Stuart-Fox,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ibute, Trade and Influence*, p.33.

<sup>②</sup>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No.2, 2011, pp.147–178.

<sup>③</sup> Alan Chong, “Form as Substance: Elements of Diplomacy from Premodern and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in C. X. George Wei, ed., *Asian Culture,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 Leiden: Brill, 2022, p.175.

hypocrisy)”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点。<sup>①</sup>每一个国际体系或社会都有一套定义适当行为的规则或规范,但有些规范从未被自动地遵守过。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下,古代中国的皇帝关心的是周边邻国是否会前来朝贡,对朝贡国之间的交往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做任何干涉。因此,即便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相互朝贡的形式,只要不妨碍这些朝贡国对中国的朝贡行为,中国通常会保持沉默。朝贡关系中存在规律性和精确性、策略性的模糊性以及象征性操纵三种运行机制,权力关系仪式化减少了权力差距带来的紧张。<sup>②</sup>这为曼陀罗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对东南亚小国而言,向本地的曼陀罗中心朝贡和向更远的中国朝贡,这两种行为在观念的理解上可能并无差异。

两种体系在实践上可谓相互需要。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佛教的地理中心观念对世界秩序观构成冲击,中国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受到动摇,但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很快就借用佛教文化来增强自己的王权观念,佛教的文化观念对儒家观念进行了部分重塑。唐代的武则天、元代的忽必烈以及清代的多位皇帝都曾采用佛教的称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东南亚国家加入朝贡体系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从朝贡贸易中壮大自己的力量。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世界中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开展贸易无疑将增强其自身的力量,有利于它们在与其他东南亚本土政治中心的竞争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出于贸易获利的实用主义动机,前往中国朝贡的古代东南亚国家往往更愿意接受朝贡体系的规范和要求。第二,中国作为大国可以为东南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小国提供保护,并能够成为地区国家之间的仲裁者。<sup>③</sup>任何一个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东南亚国家都可以将中国视为其曼陀罗的外圈,是一个可以“求援”的对象。因此,在东南亚地区大国看来,曼陀罗作为独立的区域体系而存在,不依赖朝贡体系但却与朝贡体系和谐共生。

中国与东南亚的体系互动深刻影响了双方接触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国古代的云南地区与东南亚接壤的边疆地区就是典型。云南处于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接地带,长期受中国文化、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替影响。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不少土司政权本身也是曼陀罗式的,如勐圈体系或“套盒(emboxment)”体系就是一种典型的曼陀罗结构。各勐之间彼此争战,小勐可能发展壮大成为新的曼陀罗中心,而大勐

<sup>①</sup> Stephen Krasner, “Organized Hypocrisy in Nineteenth-Century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 No.2, 2001, pp.173–197.

<sup>②</sup> Ji-Young Lee, “Diplomatic Ritual as a Power Resource: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in Early Modern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3, No.2, 2013, p.309.

<sup>③</sup> Min Shu, “Balancing in a Hierarchical System: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and the Tribute System,” *Waseda Global Forum*, Vol.8, No.1, 2012, p.241.

也可能衰弱,成为地区其他更大中心的附庸。因此,各勐的中心并不稳定,随着各勐力量的此消彼长,依附关系会发生改变。<sup>①</sup>此外,有学者也注意到,古代云南边疆的部分土司除了向中原王朝朝贡,也一度向周边强大的缅甸、老挝和泰国等国家朝贡。对当地土司而言,它们既是东南亚这些地区强国曼陀罗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本土土司曼陀罗圈层关系的一部分。

总结来看,传统研究将中国和东南亚的互动关系纳入统一的朝贡体系进行分析,这掩盖了东南亚本土的政治体系及其独特的对外理念和思维。对比亚洲这两种传统国际体系的差异和共同点,曼陀罗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且不依赖朝贡体系的本土区域体系而存在。由于双方理念的互补、对共同形式的重视以及实践上的相互需要,两种体系尽管存在冲突,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能够和谐共生。两种区域体系的共生关系、体系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为理解东南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 四 曼陀罗的现代回应

曼陀罗研究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此。曼陀罗的理论视角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研究大有裨益。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曼陀罗至少在三方面有助于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解世界体系。

##### (一) 曼陀罗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完善

曼陀罗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其理论发展对国际关系来说具有两重意义:

其一,结合东南亚本土政治单元的互动历史修正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印度学者将曼陀罗发展为现代国际体系的理论模型之一,建立了曼陀罗国际体系分析的一般框架。<sup>②</sup> 罗茜塔·德利奥斯(Rosita Dellios)尝试将曼陀罗与地区主义、大国关系等主题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曼陀罗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研究范围。<sup>③</sup> 一些学者也通过解读曼陀罗中心之间的互动历史,重新检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适用性。他们发现,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政治结构,区域等级制度与次区

<sup>①</sup> 龙晓燕:《勐、曼陀罗与大一统中国: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第22—33页。

<sup>②</sup> 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 *A Gen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93, pp.137—144.

<sup>③</sup> 部分参见 Rosita Dellios, “Mandala: From Sacred Origins to Sovereign Affairs in Traditional Southeast Asia,” *Culture Mandala*, Vol.13, No.3, 2003, pp.1—12; Rosita Dellios, “Narratives of Security in Asian Geopolitics,” *Culture Mandala*, Vol.13, No.2, 2019, pp.19—28。

域无政府状态并存，<sup>①</sup>曼陀罗中心与朝贡国存在明确的等级关系，但中心与中心之间并无明显的依附关系，朝贡国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因而次区域依然是无政府状态。这打破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体系视为等级制或无政府状态的二元假设，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另外，曼陀罗也为理解和分析霸权秩序提供了新思路。东南亚的地区大国在与古代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当存在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时，本土的地区大国依据本土的背景知识塑造自我身份，并通过挑战中国主导的规范强化自我身份认同。<sup>②</sup>

英国学派通过探讨曼陀罗完善了其国际体系及国际社会的概念。在非西方的前现代世界秩序中，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是根据自身的集体想象塑造本地区的国际社会。<sup>③</sup> 集体想象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构成了东亚朝贡社会、东南亚曼陀罗社会以及伊斯兰社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组织原则明显不同。<sup>④</sup> 与西方相遇之后，这些非威斯特伐利亚的政体创造性地适应了西方的组织和国际行为原则，并影响了各自地区主义的发展。

其二，结合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并发展曼陀罗的理论学说。一些研究涉及对曼陀罗思想文本的重新解读。<sup>⑤</sup> 张金翠将《政事论》中的国际关系思想重新归纳为世俗政治观、权力政治观、全面战争观和非伦理政治观，认为该体系是一种国际力量状况评估、零和博弈体系以及以征服者为中心的敌我联盟体系。<sup>⑥</sup> 张帆和杨潇从尼加拉体系的概念中抽象出中心点与象征性权力，分别将其视为分析古代东南亚国际体系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体系中各个层次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会导致战争或和平，而其结果将导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上升、维持现状和下降）。<sup>⑦</sup>

## （二）曼陀罗政治的传统性影响

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传统的曼陀罗转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传统的影响并不会轻易消失，甚至会以现代化的形式获得某种重生。传统曼陀罗

<sup>①</sup> Frances A. Cruz and Nassef M. Adi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Mapping New Fronti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18.

<sup>②</sup> Colin Chia, “Social Positioning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ntestation in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6, No.2, 2022, p.305.

<sup>③</sup> Barry Buzan and Amitav Acharya, *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1.

<sup>④</sup> Hendrik Spruyt, *The World Imagined: Collec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Sinocentric, Islamic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334–336.

<sup>⑤</sup>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时事出版社2020年版。

<sup>⑥</sup> 张金翠：《〈政事论〉与印度外交战略的古典根源》，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19—130页。

<sup>⑦</sup> 张帆、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89页。

关系强调王权与宗教的关系、领导人因素以及政治结构的圈层划分等要素,这些要素与现代东南亚政治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

曼陀罗与东南亚的现代民主政治相互交织。东南亚各国的民主政治虽然受西方国家影响,但在底色上仍然脱胎于曼陀罗传统政治。任何探讨现代东南亚的权力及领导力的研究都难以避开曼陀罗政治中的魅力领袖传统。现代东南亚政治中已被祛魅的传统神圣王国伴随着君主制的复兴而复魅。<sup>①</sup> 政治领袖虽然不再被视为神灵,但其传统影响仍能够助其在政坛呼风唤雨。注重私人关系的曼陀罗理念将有助于魅力领袖建立赞助人—客户网络。此外,东南亚还存在拥有大量权力及资源的集团组织,这些组织的发展非常依赖“有能力的人”的不懈努力。<sup>②</sup>

曼陀罗政治不仅是理解现代东南亚各国政治中非正式的赞助人—客户关系滥觞的重要根源,在更广阔的国家层面还可用于探讨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问题和挫折。现代东南亚各国的领土边疆建立在本土政治体系与殖民体系碰撞的废墟之上,因此在现代领土边界的形式上出现了很多问题。<sup>③</sup> 在传统的曼陀罗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相互碰撞并逐渐瓦解的过程中,很多属于朝贡国或拥有半自治地位的政治实体由于抗拒国家的同化而与现代国家发生持久冲突。<sup>④</sup> 1970—2015年泰国南部冲突的大量数据表明,在那些针对中央政权的冲突中,越靠近传统朝贡国中心的地区,暴力活动越普遍且对抗级别越高。<sup>⑤</sup>

### (三)曼陀罗与现代世界政治及外交

在世界政治及外交领域,曼陀罗仍然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概念。<sup>⑥</sup> 现代政治并不适合机械地套用传统曼陀罗的观念,但修正或者发展理论本身可以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灵感。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及国际组织均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曼陀罗政治中心,但现代民族国家仍然可以被视为曼陀罗的基本单元。另外,国际社会中存

<sup>①</sup> Roger Kershaw, *Monarchy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ces of Traditio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198–201.

<sup>②</sup> Joshua Barker, “From ‘Men of Prowess’ to Religious Militias: Informal Sovereigntie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 Vol.172, No.2–3, 2016, pp.179–196.

<sup>③</sup> Ian Harris, “Rethinking Cambodian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erritory: Genealogy of the Buddhist Ritual Boundary (*Simā*),”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41, No.2, 2010, pp.215–239.

<sup>④</sup> 参见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226页。

<sup>⑤</sup> Christopher Paik and Jessica Vechbanyongratana, “Mandala Matters: Former Tributary States and Modern Civil Conflict in Thailand,” <http://www.eh.net/eha/wp-content/uploads/2018/06/Vechbanyongratana.pdf>, 访问时间:2023年3月1日。

<sup>⑥</sup> Alison Weisbrode, *Global Diplomacy: Theories, Types, and Model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125–138.

在大量的国际组织，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视为有组织边界的新曼陀罗。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现代复杂的国家间互动以及变化中的国际体系就可以基于曼陀罗的视角对其加以分析。

借助曼陀罗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印太”地区概念化为四个重叠的曼陀罗次区域——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大洋洲。<sup>①</sup> 这四个地区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是主导者，已经形成曼陀罗双中心体系，美国则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sup>②</sup>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和美国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域外国家，而东南亚各国借助东盟相关机制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日本和印度也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试图阻止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优势地位。在东北亚地区，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忠实的同盟国，都采取了阻止中国主导东亚地区事务的政策。大洋洲虽然尚未出现强大的力量对抗，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加强合作耿耿于怀，不断伺机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这四个次级曼陀罗之间的边界处于流动和可变的状态，随着大国势力的介入，地区格局就产生了不确定性。从内容上，曼陀罗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将取决于各方的军事因素（战争、军事基地和后勤协定）、经济因素（贸易和投资模式）以及政治关系（联盟和追随者）等互动形式。<sup>③</sup>

中国是美国维持全球曼陀罗中心地位的最大变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可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太平洋地区”的曼陀罗中心。<sup>④</sup> 但是，即便承认中国是“印太”的新曼陀罗中心，东亚地区及其以外地区的其他曼陀罗中心的力量加总仍有可能胜过中国。<sup>⑤</sup> 考虑到“印太”地区四个曼陀罗次区域及大国的相互制衡，中国的潜在优势面临诸多挑战。

作为可以被用来“制衡”中国的潜在角色，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从东南亚各国的实力来看，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中等国家或小国，处在更大的区域曼陀罗中心——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国相互交织的影响力下，该地区也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

<sup>①</sup> Manjeet Pardesi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cient India,” in Daniel Bell, et al., eds., *Bridging Two Worlds: Comparing Classic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Statecraft in India and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pp.298–299.

<sup>②</sup> Pak N. Wong, *Destined Statecraft*,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p.93–94.

<sup>③</sup> Manjeet Pardesi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cient India,” in Daniel Bell, et al., eds., *Bridging Two Worlds: Comparing Classic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Statecraft in India and China*, pp.298–299.

<sup>④</sup> Andrew Abalahin, “Realms Within Realms of Radiance, or, Can Heaven Have Two Sons? Imperial China as Primus Inter Pares Among Sino-Pacific Mandala Polities,” in Victor H. Mair and Liam C. Kelley, eds., *Imperial China and Its Southern Neighbour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pp.338–364.

<sup>⑤</sup> Oleg Pakhomov,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East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22, pp.99–114.

的新曼陀罗。传统的曼陀罗对东南亚地区的制度化合作以及东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曼陀罗提供了区域形成的思想和理念,东盟则将其转化为一种合作机制。<sup>②</sup> 传统的曼陀罗世界观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东南亚国家遵从务实的现实政治,同时倾向于保持国家生存、国家主权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sup>③</sup> 有印度学者建议,东盟应与印度一起构建东盟—印度新的曼陀罗中心,共同制衡中国。<sup>④</sup> 但考虑到曼陀罗的历史传统以及东盟的自主性地位,东盟更有可能参考传统的曼陀罗外交方式,强调中立、自主及平衡外交,谨慎地处理与域外大国的关系。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前提下,曼陀罗有望为东南亚各国的现代外交注入智慧。印度尼西亚的神王文化与其现代外交传统密不可分,这一思想已经被本地化,服务于国家建设以及对外关系。<sup>⑤</sup> 曼陀罗深刻影响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精英的外交政策观念。<sup>⑥</sup> 随着“印太”地区成为一个新的同心圆,印度尼西亚外交将依据现代曼陀罗观念构建对其有利的外交政策。<sup>⑦</sup> 印度尼西亚建设“全球海洋支点国家”的力量源自过去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等曼陀罗强国的神话记忆,并成功将其转化为新的集体认同。<sup>⑧</sup>

## 五 总结

曼陀罗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具备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完善国际关系案例分析的重要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曼陀罗是一个可以解释所有国际关系的概念。以东南亚地区为基础,曼陀罗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创新潜力可以从国际关系史和现代世界政治两方面加以拓展。对东南亚的历史及其传统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可以作为国际关系领域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2–93.

<sup>②</sup> Samuwel Padmakumara, “The Concept of Mandala and ASE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outheast Asian Region Formation,” [http://heaig.org/images/proceedings\\_pdf/H0917425.pdf](http://heaig.org/images/proceedings_pdf/H0917425.pdf), 访问时间:2023年5月8日。

<sup>③</sup> Anja Jetschke and Jürgen Rüland, “Decoupling Rhetoric and Practice: the Cultural Limits of ASEAN Cooper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22, No.2, 2009, p.188.

<sup>④</sup> Ristian Supriyanto, “The Indo-Indonesian Defence Relationship: Towards a Convergent Mandala,” *India Review*, Vol.12, No.3, 2013, pp.191–217.

<sup>⑤</sup> Paruedee Nguiragool, “God-King and Indonesia: Re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Affairs*, Vol.85, No.4, 2012, pp.723–743.

<sup>⑥</sup> Daniel Novotny, *Tor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Elite Perceptions and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pp.327–329.

<sup>⑦</sup> Ristian Supriyanto, “Mandala Theory of Arthaśāstra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owards Indonesia’s Geopolitics and Geostrategy,” *Jurnal Penelitian Agama Hindu*, Vol.4, No.3, 2020, pp.179–190.

<sup>⑧</sup> Mohamad Rosyidin, “The Cult of Glory: National Myth and the Idea of Global Maritime Fulcrum in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2014–2019,”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29, No.3, 2021, pp.297–314.

实现创新的一个较佳切入点。东南亚本土有着丰富的一手文献(如铭文和编年史等资料)以及东南亚史学经典著作,学界可以结合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重建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史学分析。前现代东南亚本土政治体系中存在宪章国家、港市国家、高地政体及村庄政体等政治行为体,这是一个复数的区域体系。这一体系的文化基础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即使经历了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变迁,但仍未丧失曼陀罗的特色。从体系互动的进程来看,东南亚区域内部多中心的互动形成了三种稳定的体系互动模型,分别是中心—边缘模式、上游—下游模式和高地—低地模式。曼陀罗中心大国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形式同样丰富,与中国的互动引发了朝贡与曼陀罗相互关系的争论。尽管这两个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世界秩序观、朝贡关系和战争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曼陀罗应当被视为自成一体的区域秩序。对现代国际政治而言,曼陀罗依然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有助于分析和解释当今的东南亚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在曼陀罗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完善、东南亚国别政治中识别曼陀罗政治的残余影响以及探索现代世界政治与外交三方面,曼陀罗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和世界政治分析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既有研究显示,学界对曼陀罗的研究以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拓展曼陀罗的分析还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议程,未来仍然需要更多具体且深入的理论探索和案例分析。作为东南亚的近邻,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仅需要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和背景,同时也需要理解东南亚邻国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两者并重的研究将为中国学派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以及发展亚洲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截稿:2022年12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